

## • 历史研究 •

## “中国史学理论不发达”刍议

陈立柱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合肥 230053)

**摘要:**学术界不少人为中国史学缺少系统的理论建树而感到遗憾。其实这是从以西学为蓝本的现代学术视角而论中国固有之史学的,其中不乏西方中心论的印迹。西方史学之富有理论源于其形而上学的学术传统与逻辑(实质)主义的运思理路,而汉语文思考的非逻辑主义(或曰历史主义)使其不离事而言理,即体用不二,道器合一,史学重在述事、征实与会通,这与西方史学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探究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从理论的角度去看传统中国史学的贯通性思考,并不一定就是一个恰适的视角。

**关键词:**中国史学;理论;思想;逻辑主义;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7)01-0133-04

史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史学理论不发达,“中国古代史学是‘记述的史学’而没有理论”<sup>①</sup>,有的学者甚至质疑:“中国有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吗?”言下之意,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太过遗憾了,似乎只有有系统理论的史学才是有深度的史学思考。近些年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大量涌入,这种认识愈见其多,从年轻的学生到一些有声望的学者都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近些年随着对中国史学与西方学术精神有了较多的了解,渐渐明白了所谓中国史学理论不发达,是相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缤纷多彩、不断翻新而言的,同时也是站在以西方学术为基础的现代学术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史学思考,这其中不无以

西学为中心而论中学之是非的嫌疑。<sup>②</sup>真要对中国史学做出评判,那是需要对中西两种学术传统都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为前提的。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西方式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的大异其趣,这就是它的知识论传统,<sup>③</sup>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一整套知识性规定,我们今天的《史学概论》、《史学导论》一类书就接受了这个传统,讨论历史的定义、历史的客观性以及研究历史的方法等问题。还有学界最近所特别关注的“中观历史理论”等等,也属于这一类。西方以及现代史学家为什么特别注重理论的建构呢?究其实,这与西式学术的形而上学传统与逻辑主义运思密不可分,是这

收稿日期:2006-05-18

作者简介:陈立柱(1963—),男,安徽灵璧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与中外史学史的比较研究。

<sup>①</sup>这是瞿林东先生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听到的,瞿先生并且指出:“这种看法可能反映了史学界一些同行的认识”。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sup>②</sup>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与演变情况,可参看拙作《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sup>③</sup>关于西方知识论传统,近代学者金岳霖《知识论》有系统介绍与研究,最新的研究情况可参看一组《“西方知识论”笔谈》,见《文史哲》2004年第2期。

种学术思考必然会有要求与表现。西方史学开始于古希腊，“历史”本来的意思是通过调查探究而获得的知识。诚如柯林武德所指出的，在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观念里，后来的人因为不再可能参与希波战争，以及再也见不到该事件的“目击者”，重建这一历史过程完全成为不可能的事。因此在《历史》一书的开篇希罗多德便宣称，他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至于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sup>[1](P1)</sup>。因此他相信没有“目击者”亲见的事都是不可信的，没有价值的，即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可以看出，希罗多德的知识观念在根本上和整个希腊思想是一致的，这就是知识是确定不变的，而变化不定的东西是难以成为知识的对象的。这种知识观诚如柯林武德所批判的“是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sup>①</sup>。受这种传统的影响，一直到笛卡尔时代，西方的知识大家族中都没有历史学的地位。维柯以后，尤其是19世纪历史学借鉴了科学的方法才成为知识学科的一个门类。20世纪形而上学问题开始被还原为语言学问题，出现了“哲学”面对“历史”挑战的局面，人们认识到哲学只是现实历史的曲折、间接的“反映”、“反射”，它将有限的、历史的东西绝对化与无限化，或者说将“历史”“非历史化”了。<sup>[2]</sup>因此哲学形而上学的方法受到普遍的批判，到20世纪后半期西方学术界便兴起了“反对方法”、“历史没有方法”、“历史不需要理论”、“远离历史哲学”、“方法不一定能达到真理”等等的强大呼声与学术潮流，甚者则“不使用任何方法”，<sup>[3]</sup>就是这种批判的明显表示。事实上，早在黑格尔之后不久，马克思等人就提出“消解哲学”的口号与辩证地看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20世纪初期，海德格尔指出，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尔后的德里达又说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不彻底，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都曾说过，西方哲学是一种错误，一种病态或幻觉的历史。这些说法或者不免偏激的成份，但从中也可

以看出，黑格尔之后西方学术界一直在努力终结形而上学传统。现在尚在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与结果。

反过来看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国史学思考是在一个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根本不同的语境中进行的，这就是它的“未尝离事而言理”<sup>[4]</sup>的传统，“理在事中”、“理在事为之间”，“道不远事”……对于“理”的发掘必在分析人事上见。因此中国史学思考给人的印象表面看只是就事论事，缺少“理论深度”，很少提出新术语、新概念，最多如刘知幾、郑樵等人“区分类聚”，或章学诚谈谈“史意”而已。但从另一面看，不离事而言理或曰“通变在于事物”（叶适语），恰恰是不脱离具体的历史场景去说历史，一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具体地、历史地看问题，也即是古人所说的“设身处地”、“知人论世”。这与那种把历史当作“质料”，从中抽绎出“形式”，再通过逻辑演绎出一套理论的方式自然就有了分别。说出事中的理来并不就是“理论”，理论是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即形而上语言，而事之“理”只是我们平常所谓的道理，道理可以是你的道理，也可以是我的道理，颇类似于古希腊哲人所说的与知识相对立的“意见”，而理论则是知识，即不违背逻辑的“理性知识”。从逻辑上讲，你有道理我就不可能有道理，否则就不符合逻辑。这就是逻辑的道理，它的特点可以说是“专断”，而事之理则不存在这种情况。由此我们也可以想到为什么中国人会讲“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而古希腊人则认为斗争哲学才是生存的根本哲学。那么，我古人为什么会走这样一条历史致思之路呢？

这个问题，若简单说就是中国没有形而上学的学术传统。何以没有形成这样一个传统？这就与中国人思考的语文背景与西方大大不同相关。西方人使用的是拼音文字，又叫字母文字，字形上没有任何意义，纯是为了记音的抽象符号，希腊人从人们通过语言交流、思考，认为语言（口语）是心灵的符号，文字只是口语的记录，语词包含了事物的本质，认识真理就是运用理性正确地把握语词、命题与推理之间的关系，换一句话说，就是逻辑地

<sup>①</sup>柯林武德尽管高度评价希罗多德对“目击者”证词的重视，开启了所谓的科学历史学的先兆，但他也不得不指出：“我们几乎可以说，在古希腊有艺术家和哲学家的那种意义上，古希腊并没有历史学家。”参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2、30页。

运思,因而形成语音中心主义或曰逻辑(logos 最初即言语之意)中心主义的思考方式。因为这样,语言成为了“存在”的家园,解构主义者解构逻辑主义(又曰基础主义、实质主义),也要从名(词)与实着手,即进行语言学的研究,形而上学问题被还原为语言学问题,也称为“语言学的转向”就是因此而来的。反过来看中国,其学术研究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即汉字,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不仅标音,而且本身即是物事的“模拟”、“写真”,《说文》所谓“写,置物也”,“书,如也”,汉语文书写就是把生活中的人事“置移”于书中,因此它不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主要是以“影相”的方式传达信息的工具,使用这种文字的学术思考逐渐就形成以意象为特点的文字中心观。因为这样,前人一再教导说:“读书必先识字”,“由字通词,由词达意”,文字训诂学(小学)构成中国学问的门径,一如文法、修辞、逻辑构成西学的基础。在汉语文思考中,形上与形下一体贯通,或者说道器一体,体用不二,形而下即形而上之本根(西方则正好相反),没有脱离形而下的抽象之思,刘家和先生名之曰“历史主义”,以与西方的“实质(逻辑)主义”相区别。<sup>[5]</sup>具体情况我们将另文专说,这里只是指出这一点。徐复观说:“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sup>[6]</sup>中国思想虽然不是通过形上本体的建构在观念的世界上单独言说,没有西方那样的各种各样的成体系的理论,但见解深刻、思想独到的历史认识与史学评论却是大量的、内容丰富的,比之西方尤有过之,只是它们并不以“理论”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已。例如司马迁所创纪传体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纪传五体中,以王者为中心的“本纪”是为“科条”,司马迁以之考论古代以来的“王者之迹”,其中既有历史演进的时间序列、国家大事,也有王者个人的私事(它和国事密切相关),通过这种科条式的叙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中国早期历史变化大势因此得以显现出来。<sup>[7]</sup>古代的社会,皇帝或说王即是国家的核心,历史的主轴,司马迁将之列于“本纪”,视为“科条”,正与历史实际相仿佛(即“像”),表现出了“写其真”的特

点。其它“书”、“表”、“世家”、“列传”等也各有所述(像),基本的原则和“本纪”一样,体现了对于历史的写实,即通过“写”而将实际发生的事情“置移”于书中。《史记》的“实录”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以为才真正见其是。读这样的史书,我们即可以看到王者、诸侯、士大夫与百夫小民在社会结构中的金字塔般的“实像”,也能见识国家制度、经济生活与人生百态种种方面的内容,可以说过去历史概貌被司马迁以“写真”或“写意”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不像我们今天章节体史书,只是在概念上兜圈子,读了半天古人的音容笑貌也见识不到多少,这种所谓的通过科学研究而达到的“历史真相”,只能是形而上学的真相,不是历史的真相。换一种说法,观书《史记》我们仿佛可以“看见”古人的喜怒哀乐与生命活动的“影相”:他们的生,他们的死,他们生命的经历,他们与他人、社会的关联,历历在目;而阅读今人之章节体著作,不过是“倾听”史家“解释”历史,并没有“看见”历史,所看到的只是“政治”、“经济”、“文化”与“古代”、“近代”、“现代”等等字词,以及说明这些字词的断章取义的引文。再换一种说法,阅读章节体史书看到的只是从别人(史家)口中说出的所谓的历史的“特点”,而不是历史本身,而在纪传体史书中,我们却可以见识历史人物的百态景象,也即真正的“真相”。纪传体的《史记》既是历史自身的置移(写),<sup>①</sup>也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整齐故事、无征不信与贯通古今的旨趣尽在其中,正体用不二之谓也。很显然,司马迁纪传体对于历史的写实与贯通是任何一种西方的史学理论皆所不能比拟的。

如上,中国史学理论不发达,在我们看来不仅不是中国史学的憾事,反而是中国史学之福:我们没有在形而上学的陷阱中徒劳地挣扎。比如,中国过去史家从不讨论“历史客观与否”的问题,但是他们对于历史研究者、写作者的品格则反复言之,从讲究史家的才、学、识、德中追求“信史”的可能,也就是说,历史可信与否,关键在于史家的治史功夫与努力程度,信则信,疑则疑,不知者阙如。因此之故,传统中国史学中没

<sup>①</sup>关于“写”的精神,我们在另一处也曾讨论过,参看拙作《百年来中国通史写作的阶段性发展及其特点概说》,《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有与西学“客观性”相对应的词,西学中也没有和中文“史德”相对应的词。历史背景不同,学术志趣与语文表述当然不一样。还有,过去中国史家从不讨论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所谓“历史学科性质”问题(这是形而上学传统中必然会有追问),而是在史与文,史与道,做人、治世与读史等等的关系中认识历史的意义。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曾指出:“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sup>[8]</sup>可谓是对系统之理论在解说历史中存在不足的深层揭示。

理论都是自成体系、自我封闭,也是自以为是的,所以理论需要不断地超越。而思想则是生命对于人生在世的追索与理会,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思考与理解,每一时代的思考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一个个著名的思想家就像一座座连绵的山峰,构成人类自我认识不断变化的轨迹。你可以说一座山峰比另一座高,但你能说某一山峰可以为另一山峰所超越吗,或者朱熹超过了孔子?显然不能。因此在我看来,“思想”或“精神”更适合于中国史学的思考。思想者尤如古人所谓之“宗旨”;精神者贯穿其中而不见其形之谓也;体味精神,通以致用,正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的特点,只是“思想”一词更为我们时代所常用。相比较而言,“‘理论’一词通常意味着一种连贯的话语、连贯的陈述,可以说属于古典哲学的模式,是一种论说类型的表述,带有这类文体所包含的所有推理上与词汇上的局限”<sup>[9]</sup>,是形上思考或逻辑主义运思的具体表现。而从思想的角度去看中国史学,就不必要先

预设一个逻辑起点,制定一套具有形上特点的学术语言,即不必将历史之理自历史之事中剥离出来单独言说,而是直面历史,体认史家的学问境界,比较前后,看出史学的成就与不足,汇观史法义例,求索史家的精神旨趣,通贯大势,理会古今史学之变迁,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理解历史的意义。不过多地依附形上语言,从而也就减少了知性的独断。因此我认为,从思想的角度去看中国史学,更符合中国的学术传统,也与现代西方世界学术发展的大趋向颇相暗合,应该是今天理解中国史学观念的更为恰当的方式。

#### 参考文献:

- [1] 希罗多德. 历史: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2] 叶秀山.“哲学”面对“历史”的挑战[A]. 无尽的学与思[M].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 [3] 罗蒂. 没有方法的实用主义[J]. 世界哲学,2004,(4).
- [4] 章学诚. 文史通义·易教上[M]. 上海:上海书店,1988.
- [5] 刘家河. 论通史[J]. 史学史研究,2002,(4).
- [6] 徐复观. 汉代思想史,三版自序[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7] 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Z]. 中华书局,1959.
- [8]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9] 罗兰·巴特. 关于理论的访谈[M]. 世界哲学,2004,(1).

责任编辑 周文彬

## On the Statement that “Theory on Chinese History is not Advanced”

CHEN Li-zhu

(Historical Institute of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3, China)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circle, many people feel sorry for the lack of a systematic theory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fact, it is from modern western academic angle to evaluate Chinese inherent historiography so a trace of western-oriented theory can be discerne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riginates from its metaphysical academic tradition and logicism while Chinese non-logicism or historicism make comments according to certain affairs and focuses on narrating, ver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which is strikingl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historiography, which seeks for the study of fixed knowledge. Therefore, it is not always an appropriate angle to evaluate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a theoretical viewpoint.

**Key Word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ory; Thought; Logicism; Historicism